

深度 國際 評論

韓國八十年代的武俠熱：在社會抗爭的年代，金庸小說如何影響了韓國年輕人？

這股金庸武俠小說熱風在韓國延續了十年，然後化為清風縈繞在讀者心頭，使那一代韓國讀者至今對香港抱有好奇與好感。

特約撰稿人 徐圖之 | 2022-01-22



韓國BTS防彈少年團在2020與2021年連續兩年有六首歌曲登頂美國Billboard音樂排行榜，2020年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等四項大獎，2021年韓劇《魷魚遊戲》橫掃世界、征服了各國觀眾，2022年初播完的韓國綜藝《單身即地獄》打入全球收視率前十位……

近三年，韓國影視音樂綜藝的成績，已超越20多年前主要在亞洲流行的紀錄，連一向對本國多有批評的《韓民族日報》都驚呼：「K-pop和韓劇通過社會性信息和韓國故事橫掃流行文化帝國、娛樂產業發源地美國」，同時也通過互聯網席捲了全世界。

不過，該文結尾也擔憂：韓國文化振興院美國商務中心主任周聖浩表示，香港電影也曾經風靡一時，但在重複同樣

的故事和風格後，便走向沒落，要以此為戒，創造更多樣化的故事，云云。

香港電影究竟因什麼原因走向沒落暫且不提，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香港影視也曾經在韓國創下奇蹟。本文要講述的，是一段香港金庸小說與韓國社會的特別因緣。

金庸小說在韓全盛時代：銷量逾800萬冊

以周潤發主演的《英雄本色》為代表的香港動作片，於1986年夏天在港上映，韓國則是近一年後的1987年5月底公映，不過影院票房成績並不理想，累計觀眾只有一萬八千人。它的大熱，主要得益於通過當時流行的VHS錄像帶觀賞，熱門韓劇《請回答1988》便有相關場面。TVB武俠劇《射鵰英雄傳》（1983年版）也是直到1988年才以錄像帶形式輸入韓國。但華語世界讀者有所不知的是，在此前席捲韓國的，則是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股熱潮至今猶有餘溫，金庸小說新的影視改編作品，在韓國都能引發網絡關注討論，而在韓國書店及電商平台，金庸小說及漫畫等書籍也是常銷書。

以當年的幾則韓國新聞報導為例：

1986年2月19日《京鄉新聞》：把武俠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小說《英雄門》（「射鵰三部曲」集結出版的韓譯）在書店街掀起旋風式人氣，並介紹說研究金庸的「金學」已在台灣登場，當地出版了18冊研究叢書。該報同年6月27日繼續報導：出版五個月來，《英雄門》第一部《蒙古之星》（指《射鵰英雄傳》）及第二部《英雄之星》（指《神鵰俠侶》）已出版的三卷本合計銷量突破20萬冊，後續第三部《大平原》（指《倚天屠龍記》）也將繼續發行……

1986年4月16日《每日經濟新聞》：金庸小說《英雄門》在首爾大型書店小說榜排第二、三位。首爾有賣這些武俠小說的漫畫店主也表示，大學生反應很好，中學生也說「有趣」，讀者為書中武功的「掌風」等驚人的力量所傾倒。



1980年代，韓國出版社高麗苑的以《英雄門》的書名，翻譯出版包括《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三部武俠小說在內的「射鵰三部曲」。網上圖片

1987年12月24日《京鄉新聞》報導：韓國最大書店教保文庫統計了從1981年6月至1987年底銷售的2300萬冊書數據，發布了「八十年代暢銷書排行榜」，其中，1986年出版的金庸小說《英雄門》排名第十，也是前十名中唯一的華文作家作品。另據1986年版《韓國文藝年鑑》引用的教保文庫該年暢銷書排行榜，《英雄門》在前二十名中排行第七。

1994年8月28日《京鄉新聞》的報導《大學街武俠小說人氣》說，西江大學（前總統朴槿惠的母校）圖書館統計過去一學期的借閱數據，發現大學生比起詩集、隨筆乃至名噪一時的社會科學圖書，更愛讀武俠小說。在文學類書籍借閱榜上，前七名中有五本都是武俠小說，台灣作家臥龍生與香港作家金庸幾乎平分秋色：前者有三本作品上榜，後者的《長白山脈》（即《雪山飛狐》）和《東方不敗》（即《笑傲江湖》）分別居第三、六名，而第七名的韓國小說《退魔錄》也算是另類武俠小說。大學畢業生也是一邊準備就業一邊讀武俠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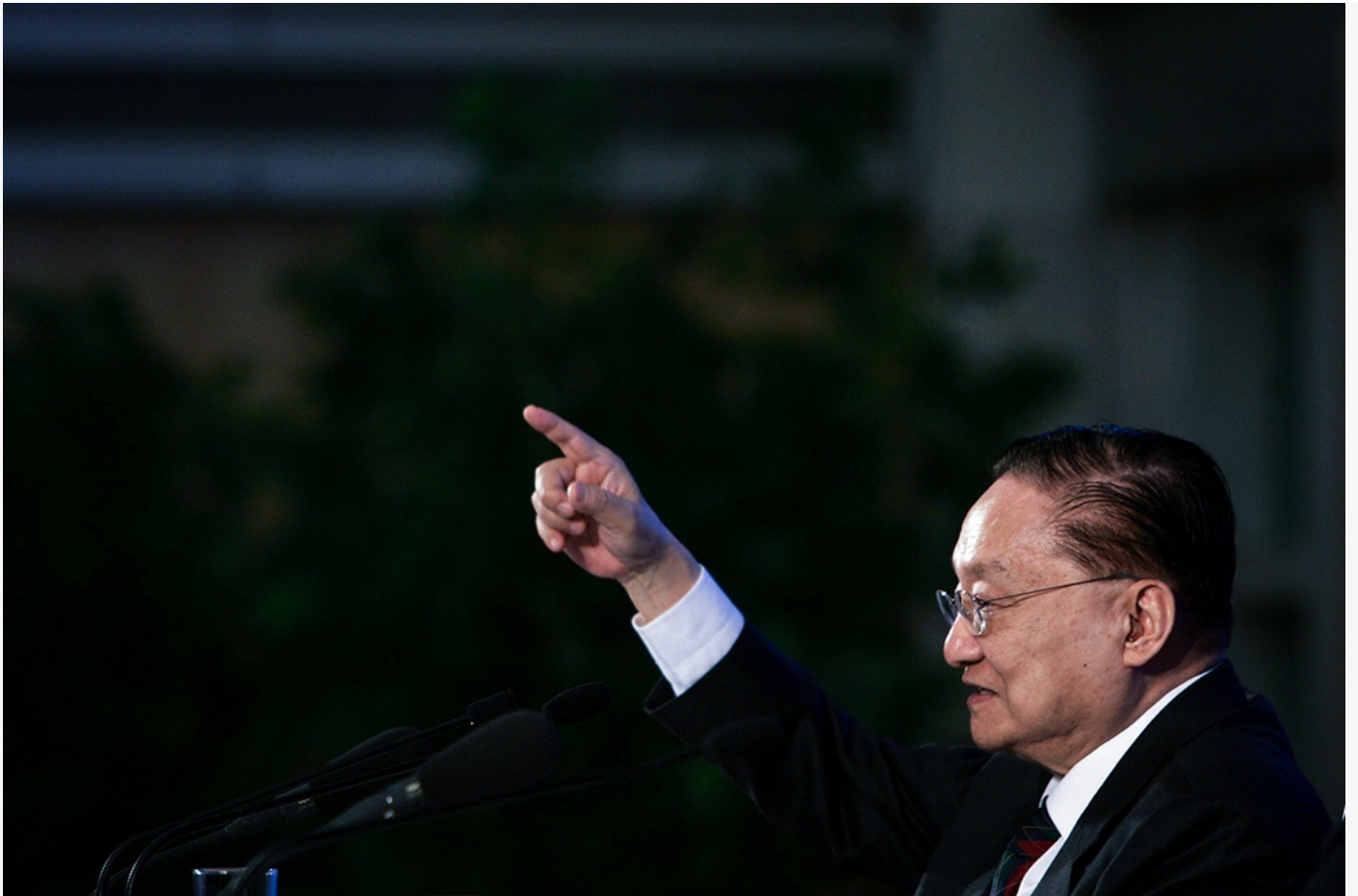
那麼，金庸小說在韓國究竟賣了多少本呢？目前並沒有完全的統計，僅以韓國仁荷大學教授鄭鍾賢在2015年9月17日網絡版《韓民族日報》發表的「光復70年，讀書記70年」系列第十篇文章《1980年代，武俠的世代》來說，他認為「小說（《英雄門》）銷量超過800萬冊」。需要指出的是，這還只是以《英雄門》為名出版的「射鵰三部曲」的高麗苑出版社的銷量，這個版本一套書三部小說共18冊，即平均賣出逾44萬套書。該社1997年3月因金融危機停業，從1996年3月出版的《英雄門》第二部《英雄之星》第四冊版權頁來看，該書從1986年7月初版一刷到1996年3月三版一刷，共印刷發行41次。這樣估算，800萬冊銷量不為過。除此之外，還不計其他出版社以其他書名出版的版本。僅以在韓國最受歡迎的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為例，該書至今已出版至少12個譯本（還不包括漫畫版），其中

1986年同一年就有四個版本，分別叫《英雄門》第三部《中原之星》（高麗苑）、《大平原》（母音社）、《大漠英雄記》（金河）、《英雄志》（東亞文藝）。顯然，譯為《大漠英雄記》是把它和《射鵰英雄傳》弄混了（1986年版《文藝年鑑》更誤寫成《大韓英雄記》），後來有出版社改成《大陸英雄記》重新出版。

出現這樣的混亂狀態，乃是因為當年韓國的版權法並不完善，這幾家出版社並未得到作者金庸的正式授權就互相競爭擅自出版，當然這種情況在1960-1980年代的台灣、1980-1990年代的中國大陸同樣存在。韓國出版社在2000年代才有授權版金庸小說以原始書名翻譯上市。另外，為了吸引韓國讀者，韓國出版社一開始會自行改名出版，因為當時一般韓國人並不清楚「射鵰英雄」是誰、「神鵰俠侶」又是誰、「倚天屠龍刀」又是什麼。於是，《倚天屠龍記》除了上述書名外，還有《屠龍神劍》這樣易懂的別名；《射鵰英雄傳》也叫《九陰真經》、《華山論劍》；《書劍恩仇錄》改名《清香妃》、《碧血劍》又名《金蛇劍》、《白馬嘯西風》和《鴛鴦刀》都叫《雪山客》、《連城訣》叫《北海之星》、《鹿鼎記》亦稱《韋小寶傳》、《雪山飛狐》和《飛狐外傳》合稱《長白山脈》，既是因為故事確實發生在長白山，也由於當年韓國作家趙廷來的長篇小說《太白山脈》正在熱賣，正好蹭熱度。

金庸小說登陸韓國，始自1985年。當年高麗苑出版社首先將《射鵰英雄傳》以《英雄門》為名出版，但作者名字寫成了「金勇」——要知道，金庸的本名「查良鏞」此前僅於1979年初在韓國媒體出現過一次，那次他以香港《明報》社長身份分析中美建交對韓半島影響的評論被《東亞日報》駐日特派員注意到。以「金勇」為作者名的首次出版效果自然不佳，因為此前二十年，韓國流行的武俠小說，作者基本來自當時與韓國有外交關係的台灣，其中輸入最早、韓文譯本最多的作家是臥龍生，另外還有司馬翎、諸葛青雲、上官鼎等人，他們的作品被韓國學者金秉喆評價為「怪奇物」（見《韓國現代翻譯文學研究》），被韓國出版業界認為是供成人逃避令人不安的現實的避風港，畢竟他們書中雖有刀光劍影兒女情長，但所謂的江湖是哪朝哪代？與現實有何關係？令人一頭霧水。

於是，頭炮啞火的高麗苑改變策略，他們大概也發現了金庸的主要小說不同以往台灣武俠小說的特點：那就是人物和故事之外龐雜的中國歷史文化背景：從宋朝到清朝近千年歷史長河中，除了王朝興衰外，還有儒道釋三家的天文地理、陰陽五行、九宮八卦、詩詞歌賦等等，雖然距今天仍有不少時空距離，但在對歷史特別痴迷的韓國人看來，顯然親近了不少。結果，以「中國歷史大河小說」之名推出的金庸小說《英雄門》廣告在韓國各大報乃至電視台鋪天蓋地地推出，經過讀者親身驗證口耳相傳後迅速打開了熱銷局面。這次，不只是「成人的童話」，連初、高中生也愛不釋手，1972年出生的韓國人李鍾哲（音譯）在《獻給「英雄本色」世代》一書中回憶，當時和他一樣讀高中的同學，都是在教室內自習時偷偷摸摸、津津有味地翻看人氣武俠小說《英雄門》。



2018年10月30日，知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逝世，享年94歲。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這股金庸武俠小說熱風在韓國延續了十年，然後化為清風至今縈繞在讀者心頭，至於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初期曾閃耀韓國書市的台灣武俠小說，包括最出名的臥龍生及後起之秀古龍，其作品韓文版已絕版幾十年，無人問津了。

如果故事到此為止，那也只是一個「香港製造」的異國風情插曲。韓國媒體在1980年代在報導大學街武俠小說熱時，曾期盼創造出國產武俠小說大作，很快他們就做到了。那就是金洪信《人間市場》系列小說，該書全十卷，也曾入選上述教保文庫「八十年代暢銷書榜」第四名，並改編成多部影視劇。不過，更貼近「武俠」的韓國小說另有其作者。

韓國本土武俠作者與80年代的抗爭運動

武俠小說變禁書作者破天荒坐牢

就在以現代人口買賣市場為背景的除惡揚善小說《人間市場》，開始在雜誌連載的1981年，名叫樸永昌韓國大學生也寫作並出版了武俠小說《武林破天荒》，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因此在文壇名利雙收，反而驚動了全斗煥政府的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和保安司令部，於當年8月被逮捕並起訴，檢察官要求判處其七年有期徒刑，並於次年2月被法院判刑三年。罪名是違反《國家保安法》、《反共法》及《戒嚴法》，在小說中滲入共產主義理念。當時報導此案的媒體通稿不足一百字，只說他自己製作並販賣的小說有2000冊，事發後被全部沒收。另外，身為延世大學學生的他，曾於1980年3月在校內與兩名同學一起製作反政府大字報，前後共計兩次。

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一例也是唯一因寫武俠小說而坐牢的文字獄。直到12年後的1993年，因《武林破天荒》而破天荒實際服刑兩年（1983年遇光復節特赦出獄）的樸永昌，在韓國實現民主化保障了言論出版自由後，才正式在出版社重版了這部小說。他透露，自1980年就開始為人打工翻譯武俠小說，寫武俠小說也是為了補貼學費，當時是作為漫

畫的台本用的，並非單行本。小說中正派與邪派人士為爭奪武林霸權而互相鬥爭，「揮動無所不為的權力的邪派」被指影射當時的全斗煥軍政府、「人類社會的矛盾是階級矛盾」等字句被指引用唯物辯證法鼓吹階級鬥爭，這些只有兩頁紙的內容因與《國家保安法》抵觸而犯了大忌。不過，也有人指出，小說的要害是對立的兩派叫「江北武林」與「江南武林」，而後者影射的是所謂「南民戰」（南朝鮮民族解放戰線）——1979年被韓國內務部宣布為反國家組織的團體，共有74人被檢舉或通緝，受連累的就有一樸永昌的一名學會前輩，他自己也因此被安企部調查。

樸永昌1983年出獄後開始翻譯《鹿鼎記》、《天龍八部》等，從1986年至今翻譯出版了九部金庸武俠小說，至今筆耕不綴，最新一部是去年修訂版12卷本《鹿鼎記》，可以說是活躍時間最長的金庸小說韓文版譯者。此外，除了重版三卷本《武林破天荒》外，他還創作了以1997年總統大選為主題的政治幻想小說《大權天命》等作品及武俠評論，總算沒人再找他的麻煩了。



武俠詩人變身大片導演

在1990年代，像樸永昌那樣當時30多歲、在1980年代或多或少參與社會運動、生於1960年代的韓國一代人，被稱為「386世代」，詩人庾河也是其一，後來他成為導演，拍出《江南1970》等多部賣座電影。1980年代，他曾在詩中提到「武林破天荒」，另一本詩集《武林日記》有諸如《與一位武俠小說作家的對話》、《空心大師》、《中原武林太平天下》等篇章，可見對武俠小說之熟稔。

庾河詩中也充滿了對當時軍事政權的諷刺，他以武俠小說式的場面寫道：「花瓣也流血了，春雨也濺到血腥的肉點」，「河南的大血劫」便是影射1980年屬於湖南地區全羅南道首府光州發生流血鎮壓事件，前述仁荷大學教授鄭鍾賢認為，1980年代韓國社會充滿了「武俠精神」，「正義的人看到那股血雨腥風，怎能與邪派（軍事政權）妥協呢？此後，在野蠻的壓制下，冤死不斷。抵抗不義政權、無數年輕人站在學生會館屋頂、大講堂屋頂上依靠一根繩子戰鬥的那個時期不是現代性的世界，而是武俠志（武俠小說）的世界」。

鄭鍾賢說代表事件是1980、1982年大學生火燒光州、釜山美國文化院以抗議其縱容光州血案發生，1984年264名大學生佔據執政的民正黨總部。不過，這似乎有點過度解讀了，畢竟，宣揚「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金庸武俠小說彼時尚未輸入韓國。當然，當時的韓國學生愛看的還有各種社會科學書籍，這些「批判的武器」加上後來金庸武俠小說「武器的批判」，似乎是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趨激烈的韓國抗爭運動的催化劑之一，而根本原因還是社會與政權本身存在的問題。

武俠與學運成就小說家金英夏

見證並參與這一從獨裁向民主轉型時代的另一位386世代人士，就是小說家金英夏。金英夏的父親是職業軍人，或許顧慮到當時韓國社會軍政府與學生的緊張關係，他大學科系選擇的是商學院（韓國稱之為「經營學科」），學校正是神學院學生樸永昌就讀的名校延世大學。延世大學商學院的座右銘是「change the world, lead the future」（改變世界，引領未來），它是完全有資格這麼說的，因為韓國現代史的分水嶺——[六月抗爭](#)的代表人物李韓烈正是商學院1986級學生（電影《1987》中有刻畫，其母親今年1月9日去世），金英夏正是李韓烈的同級同學。

2017年，六月抗爭三十週年之際，李韓烈紀念事業會出版了傳記《1987李韓烈》，為之作序的就是小說家金英夏。金英夏說，他那一級學院同學有460多人，兩人不在一個班，所以沒能和李韓烈一起上過課，平時李在學生會館三樓的漫畫人社團活動，他則在四樓的國樂研究會。不過，1987年6月9日李韓烈在校門口示威被催淚彈擊中的前一天，他們在三樓偶遇。而6月9日後直至7月5日李韓烈在醫院去世，他都沒回過家，只在學校和醫院間奔走。平時不怎麼參加示威的同學這次很多都是這樣度過的，他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當然參加了百萬人云集的李韓烈葬禮。雖然盧泰愚宣布「6·29宣言」啟動總統直選等措施，但那年底民主派候選人金大中和金泳三鶻蚌相爭，致使軍人盧泰愚漁翁得利當選總統，金英夏等人雖然感到幻滅，但是堅定了參加學生運動的決心，直到大四那年。

金英夏大四上學期正是1989年下半年，11月學生處告訴他和學生會一班人，某財團提供了一筆獎學金可供他們寒假集體海外旅行之用。經商議，他們決定去中國大陸。因為平時對中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加之「六四事件」發生不到半年，他們想去實地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於是，1990年1月底至2月初，金英夏開啟了人生中第一次海外旅行。那時，北京剛解除戒嚴令沒多久，尚未與中國建交的韓國的這群學生經香港轉機，先到上海再去北京，參觀了魯迅公園、天安門和故宮等景點。與學生同行的，還有負責監管的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的一名職員，和延世大學所在的首爾西大門警察署的安警官。此行的重點發生在北京大學，金英夏和一名學弟

趁大家休息之際，跑到北大某宿舍找到一個男生聊天。所見所聞令他失望：他原以為宿舍會張貼毛澤東畫像，沒想到卻是一張巨大的美國地圖；而這個北大男生的夢想是學好英語去美國留學。

金英夏在2019年出版的隨筆集《旅行的理由》（台灣中譯本名為《懂也沒用的神秘旅行》，以下譯自韓文版）中直抒了對30年前的中國的失望之情：

「我們向他詢問了幾個月前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他只露出曖昧的微笑，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對於柏林牆倒塌等事件，他也沒有多說什麼。」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就很多主題進行了這樣那樣的對話。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幻想的首爾大學生和夢想去資本主義美國留學的北京大學生的對話斷斷續續地繼續着。然後突然清醒過來一看錶，比約好一個小時足足過了兩個小時。」

「我們已經看到柏林牆倒塌，也看到天安門事件被人民解放軍的坦克鎮壓。對於知道十年前光州市民的抗拒就是這種方式被踐踏的我們來說，也許在旅行前就已經放棄了對中國的希望。因此，那次旅行就像股票投資者的虧本清倉一樣。」

「這可能與我在中國所經歷的現實，以及對它可能引起的一種精神暈眩的恐懼有關。社會主義中國與我在看書時想像的國家截然不同。不是所有人民平等生活、沒有壓迫和剝削的那種國家，而是共產黨支配的開發獨裁國家。領導人以（當時我憎恨不已的）朴正熙、全斗煥的經濟政策為榜樣，年輕精英們羨慕美國，人民難以置信地寒酸、狼狽不堪。」

從幻滅的中國回來後，金英夏開始準備研究生考試；在此期間，安警官打電話告訴他因曾參與學生運動被通緝，但經解釋和擔保免於被捕。金英夏自此開始淡出學生運動，考上研究生後，「在研究生院開始寫的小說成為了我一生的事業」，而這部沒有在隨筆中點名的作品，就是1992年6月出版的長篇武俠小說《武俠學生運動》，因為該書版權頁的作者簡介寫的是「金英夏現在延世大學經營學科碩士課程（就讀中）」。



金英夏後來與《cine21》雜誌對談時承認，起初他只是在當時剛開始流行的電腦網絡上寫了大概4頁紙的武俠小說斷章，一家出版社社長看到後提議把武俠與韓國學生運動結合起來寫一本書，於是就有了長篇小說《武俠學生運動》；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看過也不喜歡武俠小說，也沒想過自己會當作家，他為創作第一次讀了武俠小說。當時韓國流行的武俠小說就是金庸的作品。據此推斷，他必定要先讀一些金庸武俠小說了解基本的「套路」才行，因此書中才有了「戒嚴陣法」、「緊急陣法」這樣的武功招式（分別影射《戒嚴法》及朴正熙頒布的九條總統緊急措施），「鋼鐵大師」、「禿頭魔王全鬥」和他的陸士幫同門師弟「盧甲」（影射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全斗煥和盧泰愚）這種正、反派人物設定。

《武俠學生運動》正文有11章，另有一篇作家後記及附錄《80年代學生運動歷史》，因為該書內容簡介就說是以武俠小說形式再現直到1987年6月29日的韓國抗爭史。金英夏在後記中表達了他對以武俠寫史的擔心：會不會醜化在熾烈的1980年代生活過的人們？或者刻畫成英雄主義？十年後他在《cine21》對談中說，確實有朋友讀後不快，但他認為何必那樣想呢，現代小說的重要精神就是笑的哲學。

正是憑着這本在後記中獻給已故同學李韓烈的處女作引起的巨大反響，金英夏被推薦給大型傳媒集團中央日報旗下的《月刊中央》寫連載假想武俠政治小說《大權武林》，其中1993年7月號那篇的內容是，時任總統金泳三在青瓦台中槍！結果惹來青瓦台打電話向報社抗議。或許因為闖了這個禍，金英夏不再寫武俠小說，《武俠學生運動》從未再版，也沒有列入他的作家自傳中的作品名單。但不能否認的是，正是這本小說引領他走向創作之路，後來陸續發表多部作品，包括《光之帝國》、《殺人者的記憶法》等並改編成電影，出演《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等綜藝節目，小說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並多次獲獎，成為在世界上也頗有名氣的韓國中堅作家。

以上就是樸永昌、庾河、金英夏三位都在1980年代上大學的韓國青年，與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作品的因緣，武俠小說改變了、成就了他們的人生，甚至可以說因禍得福。因為1980年全斗煥在韓國掌權後，收緊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同時為安撫和麻痺市民，大力開放娛樂、電影、體育等產業，實施所謂3S政策（Sex、Screen、Sports）進行軟控制。其中，罕為人知（特別是對華文讀者來說）的是，先是翻譯引進出版香港名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及隨後相關武俠電影、電視劇等陸續登陸韓國，在韓國形成一股金庸武俠熱，使韓國讀者/觀眾至今對香港抱有好奇與好感。

不過，韓國人特別是青年似乎並沒有因此被腐蝕麻痺，反而激發起更高的鬥志，以上三人便是證明。

寫作與抗爭

抗爭

社會運動

武俠

香港電影

金庸

評論